

師道師說

名誉主編 湯一介 主編 王守常

中國文化書院八秩導師文集

嚴家炎
卷

嚴家炎 著

人民東方出版傳媒
東方出版社

师道师说

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

名誉主编 汤一介

主 编 王守常

严家炎 卷

严家炎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道师说. 严家炎卷/严家炎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11

(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

ISBN 978-7-5060-7857-3

I. ①师… II. ①严…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自然科学—文集 ③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Z427 ②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8065 号

师道师说: 严家炎卷

(SHIDAO SHISHUO; YAN JIAYAN JUAN)

作 者: 严家炎

编 者: 严家炎

责任编辑: 王 艳 张莉娟 李 维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7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857-3

定 价: 53.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0829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名誉主编：汤一介

主 编：王守常

副 主 编：李中华 魏常海 苑天舒 江 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尧	王守常	方立天	乐黛云	刘梦溪
江 力	汤一介	孙长江	杜维明	杨 辛
李中华	李学勤	李泽厚	吴良镛	余敦康
张立文	陈越光	苑天舒	林 娅	欧阳中石
鹿 朴	谢 龙	戴 逸	魏常海	

组织编辑：中国文化书院

中国文化书院简介

中国文化书院由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羨林、朱伯昆、汤一介、庞朴、李泽厚、乐黛云、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等共同发起，以及杜维明、傅伟勋、陈鼓应等港台及海外著名学者共同创建，于1984年10月在北京正式成立。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走向中国作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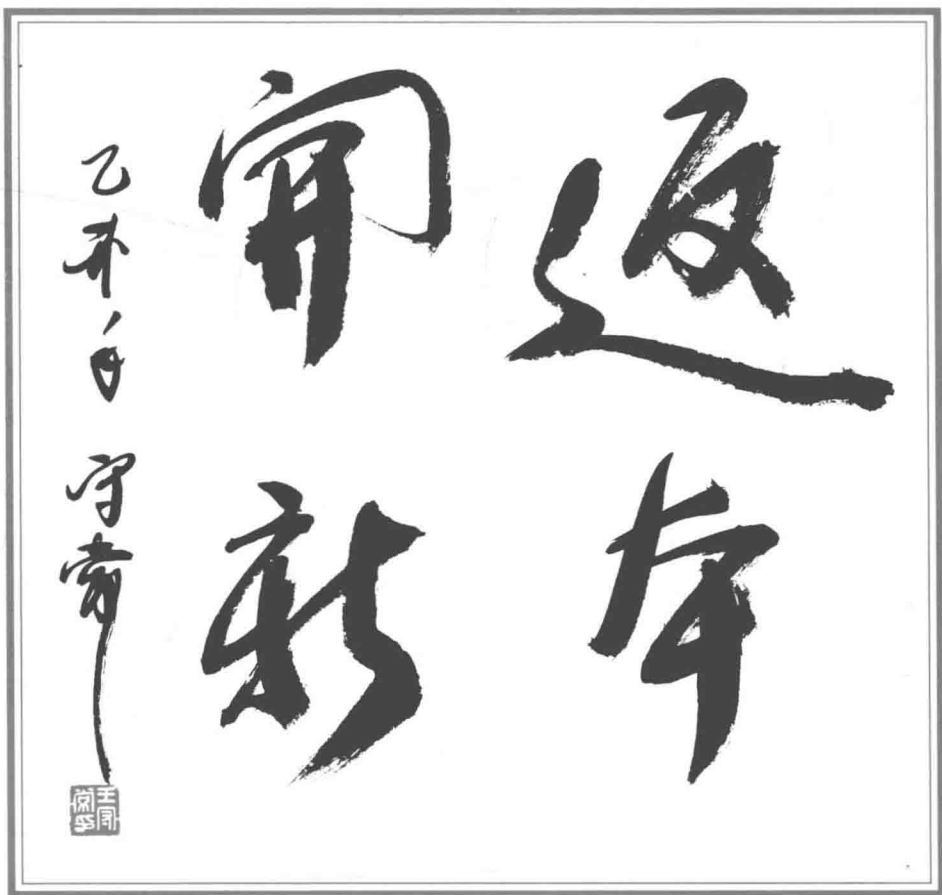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湯一介敬題

壬辰年冬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题词：

北宋张载“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先生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题词：

“返本开新”。

总序一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于1984年，是一所在众多老一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的支持下，由一批中青年学者办起来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到今年（2011）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一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点力，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1949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新办书院，并恢复了多所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院。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也许最为宝贵的是，书院集合了一批有志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他们的学术风范，无疑是当时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1984年底，文化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会，当时我们没有院址，也没有什么经费。任继愈先生说：“草棚大学可以办，我们连草棚都没有也要办。”因此，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借青年干部学院场地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梁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请他坐着讲，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梁先生在演讲中高声地说：“我是一

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这对在场二百多名听众是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中国文化书院在风风雨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支持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希望在中国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在走过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风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持激进批判态度的青年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中坚力量。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虽然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考虑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抱有的一种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我国第一流学者，而且还聘请了一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们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

历程。

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江力同志出力颇多，东方出版社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汤一介

2011年12月1日

注：此序为汤一介先生为《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所作。

总序二

星转斗移，历史沧桑，时间过得真快，去年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化书院九秩文集》，而今年就着手编辑《八秩文集》。我们在编辑这两部丛书的时候，似乎在重新认识、理解二十世纪的“学人生活史”。

我曾经多次谈过，中国文化书院已逝去的90岁以上的导师，他们用生命写就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恢弘的著作，指引着后辈学者的学术前行。

我想，如没有这辈学者融会中学与西学，从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于人文、社会学科建构了中国学术范式，我不知道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该如何发展？

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在欧风浸荡下的国难中，他们以一己之学术良知与社会担当去拯救中国，他们有过幸福，有过迷茫，有过痛苦，有过期盼，相继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带着“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的追问，离开了这个让他们梦牵不舍的祖国。

读其书，念其人，思其学，心会痛！

而今编辑《八秩文集》时。我熟悉的这代学者在这寒冷的深夜一一呈现眼前！

他们大多生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又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左右相继去世。今天，健在学者已是花果飘零。读这代学人的学术生活史，更令我有扼腕之叹！

他们在中学毕业时代满怀喜悦且自责的心态去迎接新中国的建设。尔后在“左倾”思潮的一浪接一浪中，不断否定自我价值，努力改造自己心中的“小资产阶级王国”。在那求新求变的荒诞年代，没有一座安静书房容纳了他们承接前辈父辈的学业，以便更好地投身于新中国的

建设大潮中。纠结且痛苦，让他们在中年时代，荒废了他们的学识智慧。

好在充满“思想启蒙”、“文艺复兴”气象的梦幻般的八十年代，又燃起他们的文化自觉。

他们像孩子般似的夜以继日“补课”。他们在思考西方学术的理论与方法，并理性地批评扬弃；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承继前贤学术成果，且又开创了新的研究课题方向。同时他们针对社会丧失文化的主体性及自我价值的根源，作出深刻反思并发出肺腑之言。

作为学生的我，在课堂、在各讲座中经常听到他们最爱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深切地知道，他们矢志不渝地践行他们的人文关怀。

我不禁要问，如果没有这一辈学者，二十一世纪学术如何延续与发展？我开始思考，在今天全球化思潮的中国人，如何“返本开新”，如何做到文化自觉、自信、自强？

在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三十周年之际，编辑八秩导师文集，每每想到这辈导师的声容与教诲，我不敢懈怠！

唯有坚持，唯有努力，唯有守正，让中国文化书院面向历史，立足现在，走向未来。

谢谢我敬爱的导师！谢谢你们带着我们，带着温暖的光明的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了家”。

让我们可以告慰——“这个世界会好起来的！”

王守常

2014年12月10日深夜谨识

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代序）

我从小喜欢文学。诗和小说都让我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高中二年级（1948年秋）在上海地方报纸上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后，我莫立了一生要与文学结缘的志向。从此，“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真成了我奉献的信条和毕生的体验。

上海于1949年5月下旬解放。那个暑假，我们吴淞中学高中部八九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自动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阅读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荃麟、葛琴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我们都相信：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次年暑假高中毕业，我为了圆文学之梦，竟违背家长要我进正规大学的愿望，上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先后参加淮南淮北的四期土改，又经历了农村建互助组和铜矿扩建改建的较长时间工作锻炼，连续过了六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的艰苦生活，积累了若干素材，写了一部分作品草稿和大量笔记。

然而，1955年突发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风暴，使我极度震惊。我实在无法理解，一群向来被公认为进步的作家，其中还有不少党员作家——也包括我在华东革大时的教务处长、很受学生尊敬和欢迎的老师刘雪苇在内，何以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一些私人通信，又怎么会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证”？我不禁感到事情的可怕，并陷入痛苦的沉思。于是，在一次政治学习会后的晚上，我撕毁了那几年写的一部分感情内容可能被指为“不健康”、“有问题”的草稿和笔记，第二天还向党组织交出了我收藏的胡风、路翎和雪苇的几本著作，如胡风的《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论现实主义的路》，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雪苇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我决心要变换自己

的环境和道路。1956年，恰好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知识青年读大学、读研究生，我便在这年9月以同等学力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从此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之路。

一、从可疑之处入手，凭原始材料立论

就在我研修了两年文艺理论专业课程，并逐渐明确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任务让我再次转向。1958年10月底，因中文系急需教师，我被半途从研究生岗位上调出，准备寒假后为苏联、东欧、蒙古、朝鲜等国二十多名留学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这不仅是岗位的变更，而且是专业方向的改动，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做起。我只能结合自己的备课，采用一种较为简便的办法来开展研究工作。这就是：抓住阅读中发现的一些可疑之处，紧追不舍，尽可能充分占有相关材料，深入开掘，最终获得成果。我之所以在最初阶段采取这种方式，也许跟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有关。

在两个月备课过程中，我首先读了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的“参考书”），不久又从旧书店里买到王瑶先生1953年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①上册，还翻阅了丁易等其他两三种相关的书。我发现50年代前期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为了贯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断，往往在来不及阅读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就把1916年酝酿、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当做“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划入“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时期”，认为陈独秀、李大钊当时都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我对此说持怀疑态度，于是连续二十多天

^①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因较多引用胡风的论述，在1955年胡风案件后当然失去了成为“参考书”的资格。其实这部书写作时间惊人地短促，内容却相当丰富充实，动用了作者长期关心新文学发展而形成的学术积累，虽然尚有若干疏简错失之处，但无愧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首部奠基之作。

到北大图书馆去查阅1915年到1920年间的《新青年》杂志。这是我第一次去接触《新青年》。我阅读了这个刊物上所有署名陈独秀或以“记者”名义发表的文章，还读了李大钊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的论文以及其他相关文章。这番阅读带给我许多惊喜。我终于坚信：1918年以前，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都还只是激进的民主派，并未接受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1916年，还曾经幻想中国应该走德国军国主义的道路。直到十月革命胜利，芬兰、德国、奥地利革命发生，接着是欧战结束之后，李大钊、陈独秀才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而陈又比李晚了一年左右。我不仅弄清了两位重要人物思想转变的具体事实，还考察了1918年以后《新青年》文学活动的若干新因素、新变化：一是《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成员增多，陈独秀之外，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先后参加工作，“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①，因而声威大振；二是涌现出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月夜》《鸽子》《小河》等一批出色的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学开始在全国推开；三是先进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学的重视和研究已极一时之盛，诚如瞿秋白所言：俄国文学几乎“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②。我认为，这些正是文学革命向新民主主义方向逐步转化的标志。我将这些想法连同稍后发现的若干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材料，写成一篇题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的文章初稿，给学生讲述了我的意见。后来经过修改，曾作为“五四”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在会上发表，并刊载于上海《文艺论丛》第8辑。当时颇得会议主持人李慎之先生和一些与会学者的赞誉，认为材料充实，分析细密，相当有说服力，使课题研究深入了一步。

我研究“五四”文学的另外一些文章，也大多采取这种从疑点入手的方式。例如，陈独秀的“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真像有的学者所说，要“打倒”中国的“古典文学”么？

^① 见《编辑部启事》，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

^②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新中国杂志社1920年出版。

那么《文学革命论》中为什么又对国风、楚辞、汉魏五言诗、唐代古文运动、元明戏曲、明清小说等给予高度评价，并对胡适所说“诗至唐而极盛”的提法也表示赞同？这在逻辑上怎么说得通？我经过长期反复思考，又对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外的大量文章尤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通信细读、研究和考辨，并联系陈独秀对欧洲古典主义文学的态度，终于得出结论：陈独秀所要“推倒”的“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实际上是指形式刻板、声律极严的骈文、律诗（尤其长律）以及桐城末流等一味“仿古”的文学形态，也就是他称作“中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东西。于是，我写成《〈文学革命论〉作者“推倒”“古典文学”之考辨》一文。这个答案至今已为许多学者所认可。

又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提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而首开风气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林先生认为，正是由于“五四”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立场。”对于林教授这种观点，我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者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当然无法赞成。我觉得，林先生无论对“五四”或对“文化大革命”都了解得比较表面，因而撰写了《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一文，后来又补充、扩展为《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考辨》的论文。我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新青年》在帝制复辟声浪甚嚣尘上的年代，起来批判儒家的“三纲”，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以启蒙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有着巨大的功绩。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判断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致造成“断裂”这种说法，在三个层面上都是说不通的：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这百家中的一家当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第二，这种说法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做了儒家学说的全盘；第三，这种说法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内部，原本就有王充、李卓吾、黄宗羲、戴震等非主流的“异端”成分存在，“五四”新文化就是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内部这些“异端”成分

的。我还论证了：“文化大革命”与“五四”恰好是反方向的运动。“五四”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是为了反对愚昧迷信。而“文化大革命”，恰恰在上层是个人专制变本加厉，在下层是个人迷信极其盛行的产物；它表面上是打倒一切，对“封资修”文化全面批判，实际上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回潮。“文化大革命”对于“五四”，是严重的反动和倒退；对于中华民族，更是一场少有的人为灾难。我所发表的这些看法，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赢得了不少赞同的声音。

总之，这种由发现疑点而起步的研究方式，似乎是一种舒卷两便、灵活可行的模式，它能适应多种不同的范围。大到一场文化运动的评价，小到半句文学口号的理解，都可采用这种方式应对。我的有关“五四”的多篇论文，便是这样产生的。

在这类研究过程中，最终决定着成果质量的，是作者占有相关原始资料是否充分。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时，主编唐弢先生一再强调：要“翻阅期刊，以便了解时代面貌和历史背景”，“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还开列了几十种最重要的文学期刊名单。这对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学者的成长确实极有好处。在两年多时间里，我先后阅读了近二十种文学和文化的期刊，留下了至今还保存着的十几万字的笔记，弄明白了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难问题。举例说，朱自清的《赠友》一诗，歌颂“手像火把”、“眼像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这对于说明作者思想和交往应该说都很重要。但他所赠这位友人到底是谁？原诗发表于何处？都不清楚。我翻阅了20年代初期的一些期刊，发现此诗发表于1924年4月2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8期上。在此之前四个月，《中国青年》曾刊登过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其中引录了他自己所做的两首旧体诗，正是表达了“共产均贫富”的理想。那么朱自清赞颂的这位友人，也许就是邓中夏了。然而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尚不能确切地证实。及至进一步了解到朱、邓二人都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文科学生，虽然朱在哲学系，邓在国文系，却都是1920年毕业的，完全可能是熟识